

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竞争优势： 内在逻辑与战略重点^{*}

周 文，杨正源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政策；国家竞争优势

[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制高点。为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也是赢得国际竞争战略主动的现实需要。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的渐进式创新，新质生产力以颠覆式创新为内核，其逻辑起点应是在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下的自主创新能力的重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以新型举国体制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攀升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作者简介] 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杨正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生（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生产力发展决定着国家兴衰，而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强推动力。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从国家的层面来考虑竞争力，认为“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①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进入一个创新密集时代。新质生产力作为由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哪个国家率先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哪个国家就能够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必然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项目号：23ZDA030）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 [美]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李明轩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1 页。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②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掌握发展主动权。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文献就“新质生产力”的内涵^③、形成背景^④、战略任务^⑤等做了相关理论探讨。但整体来看,过往研究较少将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竞争优势联系起来,也较少考虑大国创新竞争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在大国科技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厘清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竞争优势的逻辑关系,明确产业竞争成为现代国家竞争的新模式,做强实体经济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在澄清现有理论误区的基础上,探索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突破口,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技中心和创新高地。

二、生产力的进步是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形式,即存量扩张与增量重构,是确立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两个重要方向。存量扩张主要关注于现有生产要素的优化和提升,而增量重构则侧重于新产业、新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生产力的进步不仅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效能的跃升。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国家通过持续的市场开拓、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分工的深化,不仅可以加强其在产业中的领导地位,还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从而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一) 存量的扩张:传统生产力变迁与渐进式创新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生产和运输的规模经济催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生产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如物流、仓储和零售等,进一步增强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历史上资产阶级生产扩大的需要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方面,把生产和市场推向全世界已是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在欧洲,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迫使人们走出单一的国家 and 地域,去开拓更多更大的世界市场。因此,资产阶级带着先进的生产工具到世界各地寻找新的商机,目的是把全世界都变成资本蔓延的市场,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⑥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通常伴随着生产过程中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技术和技能的发展。

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⑦分工的深化促进了国际合作和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分享全球创新和增长的红利。在专业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③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④ 曾立、谢鹏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经济纵横》2023年第12期。

⑤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

⑥ 郝立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2页。

⑦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0页。

化分工中,国家不仅积累了特定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也培养了相应的技术人才和专业工人,为国家的长期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在没有分工的社会里,人们在自然面前相当“渺小”,单个人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①中得到彻底改观,因为这样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社会力量——“成倍增长的生产力”^②。在资本主义时代,当分工形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时候,资产阶级私有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用资本开辟市场,资本的足迹开始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类,都纷纷卷入了资本所开发的世界市场,人类历史不再是各个独立分散、封闭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地区部落史,而是“整个世界”的人类历史。

马特·里德利在《创新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传统生产力提高更多的是依靠渐进式的创新,“在前进的过程中,每一个关键的发明都是建立于前一个发明之上的,并且让下一个发明成为可能。这是一种演化,而非一系列革命。”^③也就是说技术发展并非总是线性或革命性的。很多时候,技术的进步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和逐步创新来实现的。这种“回旋”式的进步意味着技术发展往往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跳跃。技术变迁并不一定会引发创新,或者说传统的技术变迁带来的是渐进式创新,而不是颠覆式创新。渐进式创新强调的是小步改进和持续的技术优化。这种渐进式创新通常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上,通过微小的改变逐渐提高效率和产出。在船运、采矿、建筑业,尤其是农业中,这种平淡无奇的、积累式的、难以觉察的渐进式创新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

渐进式创新通常更加稳定、风险较低,并且更容易被市场接受。颠覆式创新虽然可能带来巨大的市场颠覆和经济效益,但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相对更大。然而,在全球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发达国家企图进一步固化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使中国陷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的中下游环节“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发达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的优势不被超越,在专利和技术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限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迫使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赶超,进一步增加了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这种状况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依靠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唯有通过颠覆式创新才能在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 增量的重构:新质生产力与颠覆式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内涵不是普通的科技进步,也不是生产力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实现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创新。颠覆性创新是具有基于科学原理重大突破和技术的交叉融合,即通过技术的根本性改变带来新的产业和市场,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对世界有新理解的重大发现。颠覆式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熊彼特看来是一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即创新活动应该是经济实体内部的一种“自我革新”。

1. 颠覆式创新重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

15世纪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正是依靠航海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成为新大陆的发现者和当时世界经济的引领者。被罗斯托和费尔普斯分别称为“经济起飞”与“大繁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出现在英国并使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长达百年的大国,是因为最早实现了蒸汽动力上的颠覆式创新。蒸汽机的发明是手工劳动进入机器时代的分水岭,蒸汽机本身只是一个产品,但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和产业系统以此作为基础开始形成,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正如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③ [英]马特·里德利:《创新的起源: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王大鹏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117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经典论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①而后,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导者是因为在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了颠覆式创新的竞争领先。数字革命对传统工业生产的变革同样也是颠覆式创新。数字革命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彻底改变了信息处理、存储和传播的方式。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如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和市场结构(如平台经济),对传统的商业和经济活动构成了颠覆。

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必会为生产力所决定。^②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的分工,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形式与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③从科技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国际产业大分工即是由生产力的进阶而生发的。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式样和变化可以概括为“中心—边缘”的高度等级分化和“东升西降”的格局走势,体系边缘国家存在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④国际分工演进史也深刻表明每一次分工深化背后都离不开技术创新这一最重要的推动因素。^⑤资本始终在通过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来替代对特定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随时有可能陷入衰退,因为“要素禀赋”可以被创造,当然也可以被剥夺。那些服从于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与发达国家,在财富积累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

数字经济时代,为发展中国家塑造国家竞争优势带来了新的可能。在当今时代,知识、人力资本、信息这些再生性生产要素不是先天性资源,而是各国通过后天培养起来的。正如理查德·鲍德温在《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流成本,促使技术要素与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结合,推动了后发国家的快速工业化,由此出现了“大合流”。^⑥巴克曼和韦格尔在《增长陷阱:欧美经济衰落和创新的假象》一书中也驳斥了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西方国家正迎来一场崭新的创新革命。西方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决定创新的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削弱。当今西方世界中一个主要的经济问题:颠覆性创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曾经追求异想天开、鼓励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体系如今更多是平庸无奇的产出。^⑦这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进而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创造了条件。

2.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⑧一方面,传统工业化不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加剧了自然资本和生态恢复力的枯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② 付文军:《面向〈资本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线索释义》,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④ 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⑤ 裴长洪、刘洪愧:《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⑥ [瑞士]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李志远等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第5页。

⑦ [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比约恩·韦格尔:《增长陷阱:欧美经济衰落和创新的假象》,张旭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年,第9页。

⑧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5页。

另一方面,传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例如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新型全球化时期已不具备比较优势。^①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全面超越。就其内涵而言,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粗放型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也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

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历史上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但是在未来的生产力发展模式,数据要素的介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产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随着数据成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各国对数据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轨道变化,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难得的赶超先进国家技术的“机会窗口”。日本学者中田敦在对全球制造业巨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当前最大的转变,已经由“互联网+”改造消费经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互联网×”重构工业经济、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②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③2023年12月,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描绘了“到2026年底,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广度和深度大幅拓展,在经济发展领域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得到显现”的美好蓝图。

2023年9月27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指数从2010年的第43位升至2023年的第12位,也首次成为科技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2022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到40万家,较2012年的4.9万家有明显增长。其中,有683家企业进入了2021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部分科技领域已经具备了国际领先优势。例如,在通信领域内,我国在5G的商用发展上已经实现了规模、标准数量和应用创新的多方面领先。在空间量子通信领域,我国已处于领跑地位。2016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建成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2021年,我国已可以实现跨越4600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意味着我国已成功构建出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④在新能源领域,2022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量达到1.19万亿千瓦时,较2021年增加20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⑤,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销量的50%以上。

在制造领域,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渗透到实体经济的生产和流通全过程中,为实体经济提供所需信息和知识,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和重组。工厂可以利用5G来为物联网解决方案加码,打造智能工厂,从而提高生产力和投资回报率。^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3年8月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我国基本形成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的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各地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近8000个,涌现出虚拟验证、共享制造等新场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数据显示,产业数字化取得明显进展,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

① 柳学信、曹成梓、孔晓旭:《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② [日]中田敦:《变革:制造业巨头GE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李会成、康英楠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④ 徐靖、游仪:《我国构建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人民日报》2021年1月8日。

⑤ 丁怡婷:《去年风电光伏发电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

⑥ 周文、叶蕾:《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消费经济》2023年第5期。

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 60.1% 和 78.3%。数字产业化加快发展,移动操作系统快速发展,开源生态建设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明显,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排名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以大数据、5G 通信、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也已深度嵌入农业生产全流程,为我国农业带来全新发展机遇。^① 数据要素与农业生产经营全流程有机结合,促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更加精准地掌握农业生产、经营和销售情况。这不仅能够推动农业精细化管理,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发展,亦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高效的农业机械装备、优质的种子品种以及科学合理的种植技术,显著提高了农产品的单产水平和质量,使农业生产更具竞争力。通过智能传感器监测土壤水分、作物生长情况,农民可以更科学地调整灌溉和施肥,实现精准施策,减少资源浪费;数字平台对于极端天气的预警也能有效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产业竞争成为现代国家竞争的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②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竞争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以科技创新助推生产力跃迁是大国竞争的角力点。

(一) 抢占科技制高点是现代国家竞争的核心表征

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曾经是大国争夺的主要目标,但是二战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地缘战略层面,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实力和技术的竞争,其本质则是产业的竞争。回顾历史,具备强大的高技术制造业是大国迈向强国的必要条件,也是评估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③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洞察到,“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④。富国与穷国的分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技术更好,即富国为了生产性目的,控制和利用大自然和人员的能力更为高超。^⑤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也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技术以指数级扩展,形成实体产品,正在改变社会并重塑我们的未来。”^⑥

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未来 5~10 年的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2020 年开始,无论是美国的《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无尽前沿法案》《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还是欧盟的《欧洲新产业

① 杨军鸽、王琴梅:《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生产力的视角》,《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 年第 4 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268 页。

③ 严鹏、陈文佳:《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14 页。

④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 年第 6 期。

⑤ [美] 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5 页。

⑥ [德] 克劳斯·施瓦布、[澳] 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新型社会》,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 46 页。

战略》《工业 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且富有韧性的欧洲工业》《欧洲芯片法案》，以及英国的《科学技术框架》，日本的《产业技术愿景 2020》，发达经济体都纷纷抢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等科技制高点。

从过去三十年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研发费用支出来看（图 1），发达国家在研发项目上的总支出的确在缓慢上升，但幅度不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2021 年，美国占全球研发投入的份额由 28% 降至 26%，近两年又企稳回升至 28%；欧洲占全球研发投入的份额不断下滑，由 26% 降至 22%；中国占全球研发投入的份额则由 15% 升至 23%，成为全球研发投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从研发支出增长率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 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达 30 870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2.55%，已超过英国、法国、日本、欧盟以及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共有 21 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百强，较 2017 年增加了 14 个，数量首次与美国持平，居于全球首位。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创新资源的跨国流动更为便捷，哪个国家能获取更多的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哪个国家就能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在这个机遇期，世界各国均有可能成为新产业革命的引领者，成为世界经济振兴的先行者。《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整体创新竞争力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2018 年，前者的国家创新竞争力平均得分是后者的 2.05 倍。第一方阵的 5 个国家全部都是发达国家，第二方阵除了位列第 7 位的中国外，其余 4 个也全部是发达国家。^①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经济中具有较高的话语权，正是因为掌握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创新资源，创新竞争力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竞争力上的优势占据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从而使国际规则有利于自身，并借助这些规则形成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垄断，获取超额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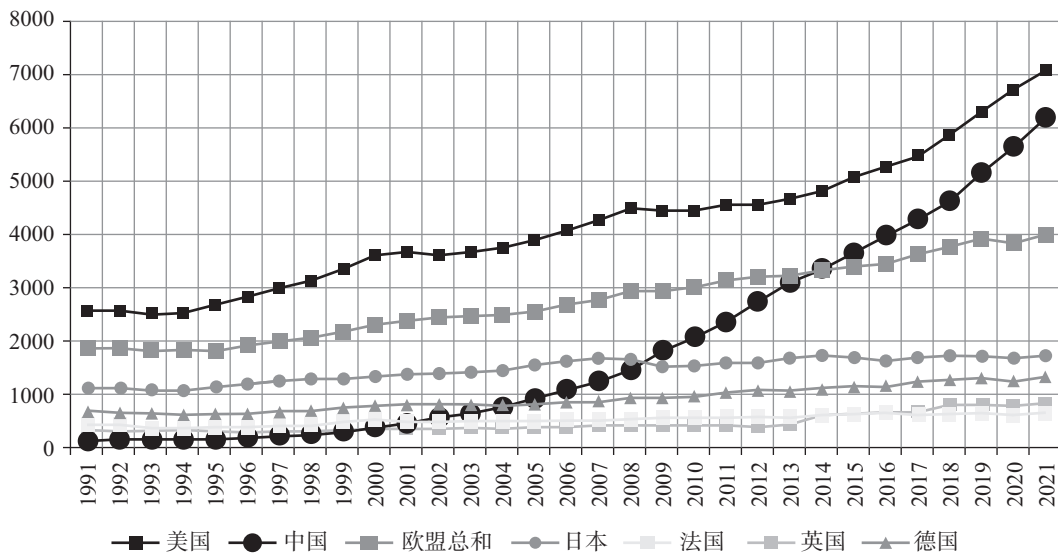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21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研发费用支出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

^① 黄茂兴等：《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49 页。

（二）做强实体经济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①。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各类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7.8%，占全球比重稳定在30%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8%、占GDP比重超过13%，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新能源发电装机量、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国际市场份额等稳居全球第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也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②。从当前世界高科技企业分布来看，美国几乎完全主导了前3轮的互联网大科技周期，并培育了一批当前千亿甚至万亿美元市值级别的巨头公司，这些公司大多位于价值链顶端，享受较高的利润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量的生产劳动投入实体经济中，再生产各部门之间就会比例失调，就会一直在产业链条的低端中打拼，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

19世纪中叶是蒸汽、煤、铁和铁路的时代，英国号称“世界工厂”，世界上的出口产品绝大部分由英国生产。1880年，英国制造的产业产品占到世界总量的23%，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一共才占到18%。^③发展实体经济除了实体经济结构优化、加大技术改造创新、优化劳动组织等措施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外力赋能、产业融合创造出新的增长点。西方国家为了重现经济繁荣之态，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也被先后采用，力求通过新能源、物联网等技术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转型升级。因此，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使得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顺利完成“惊险的一跃”，从而打通扩大再生产的整个环节，进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④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数字时代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产业数字化能够带动国内价值链主体积极参与运行机制革新活动，提高横纵两向流通、制造之间的融合协同度，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相关产业生产规模并增进产业间分工联系，深层次增加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紧密度和复杂度。^⑤发达国家都先后制订了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计划，如德国的《德国工业4.0战略》、美国的《国家机器人计划2.0》、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8》以及韩国的《智能机器人基本计划》等，都将人工智能特别是工业机器人作为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但是，同样需要注意，数字时代的中国在面临着重大弯道超车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科技差距不断拉大的风险，还存在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的瓶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根据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发布的《SMARTer2030》报告显示，ICT技术将通过赋能其他行业，帮助减排全球碳排放的20%。有助于建立起包括绿色产品设计、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在内的绿色制造体系，将从源头推动零碳发展，最大程度实现节能减碳。从服务业的角度上来看，数实融合减少了服务品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充分调用了闲置资源、存量资源和公共资源，从而构筑起平台企业、厂商和消费者三方共赢的绿色消费模式。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115页。

③ [英] 罗伯特·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贇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④ 周文、冯文韬：《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基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4期。

⑤ 洪银兴、任保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2期。

（三）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伊斯特利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指出，“要抓住技术跨越的这一机会，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以前的技术经验和良好的政府政策。”^① 一个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来克服在市场创造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否则就会出现“市场缺失”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陷阱”。^② 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同样支持了这一观点。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而创新的主体则是国家”^③。

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一个稳定、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确保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产业的健康发展。但是统一大市场从来不是免费提供的，更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市场这一昂贵的公共品的建立和运行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包括市场监管机构的建设和维护、信息公开和透明度的保障、交易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等。^④ 安格斯·迪顿也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都有着技术与知识，但是要想让生产像富裕国家那样运转起来，穷国也必须拥有富裕国家那样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电信、工厂、机械等。”^⑤ 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立往往只能通过政府，以国家财政的方式所投资建设。西方产业发展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一直在利用国家政权力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因此，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事实的真相是它们同样是依靠关税保护、出口退税、政策补贴、政府投资等政府干预方式扶持幼稚产业。正如曼库尔·奥尔森所言，“一个稳定的覆盖全国的政府建立起来的数十年后，比如1688年之后，英国的工业革命走上正轨。”^⑥ 1894年和1911年，日本重新取得本国关税的自主权，它立即提高税率以保护本国工业。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银行体系完全成熟，足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此外，日本保留了针对性的工业政策。事实证明，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对于促进日本重工业的发展非常有效。^⑦

美国政府在支持产业科技研发和竞争力提升方面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科学与国家利益》以及《美国国家创新战略》等相继发布，成为不同时期引导美国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协同效应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标志性举措。1994年在克林顿政府发布的《科学与国家利益》中，美国首次就科学政策发表了总统宣言，明确了美国科学发展的五大目标。该报告首次强调了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2022年8月公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更是给予美国芯片行业高达527亿美元的补贴，还包括向美国投资半导体工厂的企业提供25%的税收抵免优惠，相关刺激政策涉及的总金额将达867亿美元，以期通过科技创

① [美] 威廉·伊斯特利：《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②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③ [英]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张宇轩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④ 周文、李亚男：《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改革与战略》2022年第6期。

⑤ [美] 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⑥ [美] 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⑦ [英] 罗伯特·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贻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页。

新驱动经济增长，为未来的经济繁荣和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新质生产力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几个理论误区

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联系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人们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存在误区。例如，否认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忽视实体经济发展，固守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对相关理论误区进行剖析，以期厘清争议，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一）完全市场化

在制度学派的学者看来，国家仅是控制暴力和提供社会秩序的工具。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特别强调，包容性的经济制度通过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投资于新技术和新技能。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国家的角色仅限于创建和维护包容性制度，并为市场机制“提供便利”。很明显，他们不相信政府能够成功地实施发展战略。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对于积极的、干预主义的政府政策对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缺乏明晰的、系统的认识，政府政策只关注“把价格搞对”就可以了。^①但实际上，它还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消除或克服市场失灵、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工具和强大社会力量。^②

历史上的拉美地区同样有着辉煌过去。由于科技的进步，1945—1980年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与同时期工业化国家从国内走向世界实现飞跃式发展几乎同时进行。但是，随后的衰败其实早已埋下了伏笔。外国投资更多地流入了那些最不需要外国投资的相对发达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机会和必要技术优势明显。而且，它们并非总是创建国内企业家都建不起的企业，更常见的是接管现有公司。那些被接管的企业一般不是弱小或管理不当的国内公司，而是那些有可能成为龙头企业的最有活力的国有企业。^③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一方面企业研发具有溢出效应、专属性、发展滞后性等局限；另一方面，基础研究路径选择和市场范式形成往往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新技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往往无法跨越这些鸿沟，夭折于创新的“死亡之谷”。^④雅各布斯和马祖卡托也指出：“企业界只有对未来增长领域充满信心时才会去投资”^⑤。政府的责任，就是通过合适的手段刺激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的投资和企业创业，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形成比较优势的领域。^⑥此时政府采取信贷、税收、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机制等手段，可以为企业提供的风险保障和风险补偿。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形成对社会资本加大投入的带动力；同时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加大对实体经济

① [荷兰] 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郭金兴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9页。

②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③ [美] 约翰·希恩：《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贫穷、压制与经济策略》，杨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4页。

④ [美] 乔纳森·格鲁伯、西蒙·约翰逊：《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穆凤良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106页。

⑤ [英] 迈克尔·雅各布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重思资本主义：实现持续性、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与政策》，李磊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⑥ [土耳其] 丹尼·罗德里克：《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张军扩、侯永志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8页。

济、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形成有效的外部助力。可以预见，中国的科技强国建设不但面临以欧、美、日、韩为主的创新型第一集团的激烈竞争，而且极可能需要同时应对来自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追赶和直接竞争。^① 因此，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说只要依靠市场规律的自发运转就可以发挥资源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实现增长，相较之下构建起具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更需要政府主动参与其中，更好发挥作用。正如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认为，“创造力和远见这样的资源存在于所有人类经济体中，但在历史上，某些国家并不能或不愿动员这些资源，还有些国家在动员了一段时间之后没能继续下去。”^②

（二）产业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

马克思早已指出：“在 50 年代，虚拟资本先是使得工业繁荣，后又引起 1857 年的崩溃”^③。伴随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资本最大程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决定了产业资本转移至金融等高盈利行业，或者驱使产业转移至其他高利润国家（地区）。^④ 产业空心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在不断地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比重自 1990 年以来不断下降，且至今仍未见到回升趋势；但是金融业发展却呈现出过热趋势，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居高不下，大量资金流入金融等虚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受限。美国等发达国家还积极推动产业资本向海外转移，即生产全球化进程，以此缓解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停滞危机等。同时，信息技术有助于增加产业资本的流动性与灵活性，为产业资本的“离本土化”等提供重要的技术基础与物质支撑。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与滞胀危机大致同时出现，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西方经典产业结构理论存在片面强调服务业比重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的错误认识，单纯将诸如发达的金融证券产业、股票市场以及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的标志，认为虚拟经济越发达，经济现代化程度就越高。然而，脱离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只是从事“钱生钱”的简单过程，无法创造物质财富，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并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实现现代化，反而会加剧经济的泡沫化。发展中国家盲目按照根据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归纳的现代产业结构理论，刻意降低制造业产业比重，不顾自身实际大力发展服务业和虚拟经济，不仅无法解决自身面临的发展动能激发、国内消费提振、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而且导致经济“脱实向虚”愈发严重。“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回西方”描述的正是发展中国家远离制造业和技术创新，陷入更深层次的发展陷阱。

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⑤。在马克思看来，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形式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积累。而信贷资本通过参与资本积累总过程和利润率平均化从剩余价值中分割利息收入。若使金融和信贷资本发挥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推进资本积累服务于物质再生产；如若形成金融寡头垄断了金融信贷，脱离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则金融资本就会损害实体经济破坏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从生产力构成要素——要素相互作用——新的产品，社会生产力在自己的系统中循环不已、螺旋上升地向前发展，只有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得以实现，社会产品才能

① 陈劲：《科技创新：中国未来 30 年强国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 年，第 6 页。

② [英] 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37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60 页。

④ 朱东波、常卉颖：《产业空心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1 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72 页。

最终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才能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源泉。

（三）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原理从诞生至今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贸易自由主义者将其奉为圭臬；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者将其诟病为万恶之源。李嘉图从静态视角出发，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实行专业化分工并开展自由贸易是国家的最优选择。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资本要素，对贸易利益来源进行了更细致的刻画：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与要素相对价格，相同技术水平下的技术结构差异使两国形成了各自比较优势，此时按照“出口丰裕要素密集型产品、进口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准则进行贸易可以使两国都获得比较利益。其实质是强调，各国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各国应生产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产品。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恰恰是因为遵循了这种贸易原则，没有建立自己的制造业体系。^① 斯蒂格利茨同样指出，“关税结构旨在鼓励非洲国家生产原材料，而不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而这些被设定为发达国家分内的工作。”^②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只依靠一种产业实现民富国强，多产业共同协作构成的制造业体系才是立国之本。当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试图进行工业化改造时面临的不仅仅是关税、投资的劣势，还面临着技术积累薄弱的局面，发达国家除了以往的贸易关税、金融垄断手段外，还利用技术垄断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阻断正常的技术转移。随着跨国互联网垄断巨头崛起，产品内分工网络化发展迅猛，技术垄断成为新的垄断形式。^③ 当前，无论是芯片还是整个半导体产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击的范围包括从开发设计、软件平台、硬件和市场销售等全过程，同时还对外施压给其他国家与企业，联合或胁迫放弃中国科技企业产品与服务。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到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半导体的限制从最初的关税措施扩大到现今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芯片联盟等长臂管辖，限制外国企业对华出口，全方位阻挠中国半导体产业追赶。^④ 在这些关键技术产业上受制于人的“硬伤”，恰恰是由于我国这些产业长期遵循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组装等价值链中下游环节，核心技术一直无法突破的结果。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一度以比较优势理论推进以市场换技术，没有自主掌握制造业关键环节中的一些核心技术。长期发展“加工贸易”使我国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也打击了国内市场主体的研发能力，削弱了产业的配套能力。但随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世界工厂”正加速从我国往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企业尤其是贸易加工型企业面临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也就是说通过要素禀赋获取比较优势并攀升价值链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创新在重塑比较优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五、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突破口

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具体而言，要加快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激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

① 周文、包炜杰：《经济全球化辨析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李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③ 周文、杨正源：《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基于比较视角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11期。

④ 杨超、李伟、贺俊：《美对华半导体管制的趋势、实施要点与中国因应》，《产业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

牢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激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一）加快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举国体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①现在，新型举国体制有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新的核心任务，也有了新的目标定位“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②。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与互联网时代创新效率的提升相结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空间。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协同的新型举国体制。^③在“有为政府”的一面，它需要继承传统举国体制由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特点——聚焦于特定产业、目标明确且由政府专设统筹协调机构、多方调度大量资源，进行产业的创新和追赶。在“有效市场”的一面，它要发挥市场在塑造产业、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研发项目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交给企业主体来定方向并落实，创新投融资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和承担风险，创新的扩散采纳最终取决于广大消费者。

世界科技史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新质生产力所孕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对于各类知识型人才和高端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要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实施科技创新的激励制度，让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实施科研时间的保障制度，让科研工作者能够“轻装上阵，潜心聚力”。

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必需的，因为外国公司将越来越不愿意将技术许可授给新兴的后发企业，特别是当后者试图进入原本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时。通过在这个阶段设立内部研发实验室，企业必须探索学习和获取外国知识的多样化的渠道。^④对于国家而言，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如航天系统、高铁技术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不仅仅需要单纯的技术创新，更需要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入手，实现科技战略、教育战略、产业战略与金融、人才、外交战略的有机整合，通过战略视野驱动各要素的横向整合和纵向提升，为建设科技创新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全球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的引领性贡献。因此，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在明确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础上加强二者的协同配合。打通科研院所、工厂生产线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阻隔，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释放产业创新活力，激发生产力增长潜力，从而塑造坚实的国家竞争优势。

（二）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少数非西方国家（如日本与韩国）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追赶与趋同。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创新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当前，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因此，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发展制高点、打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人民日报》2022年9月7日。

③ 周文、李吉良：《新型举国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问题探索》2023年第6期。

④ [韩]李根：《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于飞、陈劲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意义深远。

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软件”支撑，数字基础设施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支撑。^① 因此，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不断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通过为产业发展提供信息技术平台，加速生产要素、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及市场方面合作共享与交互融合，不仅能提高经济活动中各环节信息资源利用率，还能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各部门运营成本。这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促使各类产业融合发展，进而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

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体系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较为普遍。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线上化、智能化的方式，缩短融资周期，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扩大再生产。数字化的经营模式也使金融服务突破地理限制，降低了金融门槛，实现更广阔的金融覆盖和更高的服务效率，从而促进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和效率。政府应科学引导金融机构，为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让企业有更多的信息识别有价值的项目并增加创新活动转化为收入的可能性，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

数字经济发展所衍生出的新型电商消费形式可有效提高市场供需匹配效率，完善就业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进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有利于解决生产、经营、流通、服务等对接问题，提高生产与服务效率，重塑产业分工协作新格局。在鼓励平台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厘清平台企业权益与责任的边界，建立全周期的监管体系，形成规范而周密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② 落实反垄断法，及时纠正和制止网络平台滥用市场地位；提高金融、公共服务、安全类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准入门槛并强化监管，防范和化解平台经济领域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扩散。

（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推进，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为应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国需把握产业转移规律，主动参与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可以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效应对外部遏制打压和不确定性风险，为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夯实基础。高技术产业是国之重器，是引领整个产业体系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赋能国家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塑造新的国家竞争优势。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2023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显示，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了29.9%。^③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今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升级要求制造业企业不断转型，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要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为破解经济增长效益不高、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能源消耗严重等难题，我国必须以提高自主创新

① 周文、叶蕾：《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② 周文、韩文龙：《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新闻办就2023年全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2024年1月12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5703.htm。

能力为核心,加速构建新型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从而带动区域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与市场竞争环境,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并吸引更多资源要素集聚发展,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创新资源的双向开放和多向流动,提高中国对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最大限度利用整合好全球创新资源。支持企业建立全球创新网络,通过主动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等途径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力争成为若干重要领域、重要规则、重要标准的参与者、制定者和引领者。

当前,我国正处于不断向中国式现代化大步前行的重要时期,外源性风险和内源性挑战相互交织。因此,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上游的过程中,必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使命。不仅仅是制造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强调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因此,要充分保障粮食、能源资源、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可靠。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等重点产业领域充分布局,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主动布局能力和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控制能力。

(四)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的生力军。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熊彼特认为真正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家。企业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等环节的参与者和实践者。阿罗则认为创造性活动需要生产高风险和高成本的科技知识。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保障研发创新主体合法权益,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为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促使相关产品及服务量质齐升,不断提升产出效率与经济效益,继而扩大产业发展规模,驱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而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与市场规则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其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特高压输电以及高速铁路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已经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高难度的科技产业创新更多需要现代国有企业来承担。^②很多大型国有企业作为产业链的龙头,有能力推动上下游、产供销衔接运转,使整条产业链的技术供给更好地面向市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因此国有企业有能力也有责任发挥重大作用。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有大型的国有企业与龙头企业,还要从广大民营企业中挖掘与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行业“单项冠军”或“隐形冠军”。^③富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生力军,能够与国有企业形成“强协同、松耦合”的研发联合体,强化专业合作配套能力,共同发展。通过减税降费、健全融资支持制度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难题。进一步营造激励创新投入的良好税制环境。同时也积极营造尊重和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更好地激发、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为新质生产力积蓄持续新动能。

[责任编辑 陈翔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

② 贾根良:《国有企业的新使命:核心技术创新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③ 周文、白洁:《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6期。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ternal Logic and Strategic Focus

Zhou Wen, Yang Zhengyuan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dustrial policy;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scalating major-country rivalry, developed economies have intensifi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and seizing the battleground of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ving faster to promo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hina to achieve greater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the country to take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when it comes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mpetition. Compared with the gradual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ake subversive innovation as the core, with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be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under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system of pooling nation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s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bottleneck” problems in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areas,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climb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ith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help Chinese companies become world-class outfits.